

「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論中國經濟學社的歷史地位及其作用

鄭會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引言

二十世紀初，特別是辛亥革命之後，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發展，越來越多的年青學子留學海外，在接觸到先進的科學技術的同時，也領略了西方各種人文主義思想。為了爭取民主，發展實業，他們深切地感到要想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必須聯絡同好，積極宣傳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因此他們回國後紛紛組織團體，普及宣傳科學知識，出版各類學術書刊。在眾多政治團體以及經濟界商會、同業公會出現的同時，大量的學術社團亦應運而生，其中著名的綜合科學技術團體如中國科學社、中國自然科學社、中國工程師學會、中華學藝社等，單科的如中國地學會、中國藥學會、中華護理學會、中華醫學會、中國化工學會、中國地質學會、中國物理學會、中國數學會等大都於此時誕生。為了促進中國科學技術和經濟的發展，這些愛國的知識份子慘淡經營，潛心鑽研學術，並提出「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的口號，希望能摸索出一條實現中國近代化的道路。據統計，民國成立的第一年申報成立的學術社團僅有5個，1919年五四運動的高潮時即已增至53個，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1931年)又增加到74個，共出版叢書279種，創辦期刊33種。抗戰前夕全國性的學術社團已激增至159個，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東南沿海大片國土淪陷，大部份社團的活動或停頓、或終止，¹但還是有一部份團體遷移到大後方，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繼續堅持活動。在這些社團中，成立於1923年並一直堅持奮鬥、不斷擴大活動的中國經濟學社即是民國時期的一個重要學術團體，也可以說它的存在與發展代表了當時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界的理論水平，表達了中國經濟學者希望國家富強、社會進步的普遍心聲。

¹ 方慶秋等：《民國黨派社團出版史叢》(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29。

近年來學術界對於清末民初商會及各類同業公會的研究甚為全面，亦有學者對於同一時期成立的一些學術社團、特別是自然科學方面的社團與機構產生濃厚的興趣。² 然而相對來說，對於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術團體則缺乏深入細緻的研究。³ 中國經濟學社既是民國時期最重要的經濟學術團體，多年來卻無任何論文對其加以探討，而且有關學社主要成員的傳記與回憶資料亦很少提及他們參與學社的活動。⁴ 因此本文只能根據學社成立以來出版的各類著作和期刊，查考了部份檔案資料，並參閱當時各大報刊的報導，通過介紹學社的創立與歷次年會的召開經過，分析學社領導成員的背景，評述學社開展的各項學術活動，探討學社與政府及社會各界之間的聯繫，從而對中國經濟學社在推動現代經濟學發展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作用及其影響予以客觀的評價。

中國經濟學社的成立經過

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期，北京既是民國政府的首都，同時也是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在北京的各個高等學府中集結著當時最優秀的一批學者。他們大多留學海外，十分留戀西方那種充滿自由爭論的學術氛圍，對於學術社團在學術活動中所發揮的作用都具有親身的體驗，因此他們學成歸國後也都想成立相應的學術團體進行交流。隨著中國科學社從美國遷回國內，一大批單科學社亦相應誕生。據不完全統計，僅1922年在北京就先後成立了中國地質學社、中國天文學會和中國化學工業會等多個自然科學領域的社團。⁵

² 如楊翠華：《中基會對科學的贊助》（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冒榮：《科學的播種者：中國科學社述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張劍曾圍繞中國科學社撰寫了一系列論文，並在此基礎上完成一部專著：《科學社團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命運——以中國科學社為中心》（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

³ 關於人文社會科學社團研究成績最突出的可以中國史學會為例，請參閱桑兵：〈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史學會〉，《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胡逢祥：〈現代中國史學專業學會的興起與運作〉，《史林》2005年第3期。

⁴ 如楊建業：《馬寅初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鄧加榮：《馬寅初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潘序倫：《潘序倫回憶錄》（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6年）；黎建軍：《抗戰前馬寅初對外貿易思想研究》（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等傳記或著作，均甚少論及中國經濟學社的活動。特別是馬寅初長期出任中國經濟學社的社長，對學社的發展貢獻極大，但有關描述他生平和學術觀點的眾多論文與回憶中幾乎沒有一篇涉及他與中國經濟學社之間的關係。

⁵ 參見張劍：〈民國科學社團發展研究——以中國科學社為中心〉，《安徽史學》2002年第2期，頁57。

這種思潮不光表現在從事自然科學的學者身上，對於研究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學者來說也同樣具有強烈的激勵作用。1923年夏，當時一批居住在北京的留美回國經濟學者就常常感到困惑，由於缺乏一個團體可以交換彼此之間的知識和意見，因而無法在一起切磋學問，特別是當時許多學者在編譯出版有關歐美學術著作的過程中，由於互不通氣而造成重複勞動，因此他們都覺得沒有合作、缺乏交流實在很難解決這些問題。正好此時擔任燕京大學經濟系主任的英國人戴樂仁(J. B. Taylor)早就有意聯合北京各大學經濟學系的教授和政府財政部門官員以及金融機關的高級管理人員組織一個學術團體，討論彼此之間共同關心的中國經濟問題，在他看來，這樣所取得的成果既可作為平時授課時之相關參考資料，又能夠為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礎。戴樂仁首先找到曾在清華學校、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任教，當時並兼任財政整理委員會及稅則專門委員會專門委員的劉大鈞商議，這一設想立即得到他的贊同，並由劉大鈞發起致函，邀請在北京的知名經濟學者陳長蘅、衛挺生、趙文銳、胡立猷、陳達、林襟宇、吳君澤、楊培昌、李炳華和外國人貝君(Blaisdell)等十餘人，在位於南池子的劉宅接連召開數次餐會，共同推舉劉大鈞為臨時主席，林襟宇為臨時書記，並推選劉、林、戴三人負責起草團體的簡章，再經多次會議討論，最後修改通過，將新成立的團體定名為「中國經濟學社」(Chinese Economic Society)。經眾人討論，商定成立中國經濟學社的目的有以下數端：(一)研究中國經濟問題；(二)輸入外國經濟學說；(三)刊印經濟學書籍及論文；(四)社員之間召開會議，互相交換經濟知識。1923年11月，中國經濟學社正式成立，並選舉出學社的領導成員：社長劉大鈞，副社長戴樂仁，書記林襟宇，會計衛挺生，出版部主任陳長蘅，副主任陳達，出版經理胡立猷。⁶

學社成立初期參加者不多，成員以北京市各高等學府中從事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教授為主，也有部份主管經濟事務的政府官員加入。此時學社的活動比較簡單，也沒有甚麼固定的形式，類似於一種談話會，主要是不定期召開一些報告會，其中一種類型是公開演講，由社員報告各自研究的經濟問題；還有一種方式就是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擔任專題演講。學社曾專門邀請梁啟超作專題演講，而當一些外國知名學者訪問北京時，學社也會利用這一機會請他們報告，如美國勞工統計專家米克爾(Royal Meeker)、美國關稅會議專門委員洪貝克(Stanley K. Hornbeck)、財政專家精琦(Jeremiah W. Jenks)、美國鐵路管理科學教授約翰孫(Emery Johnson)等都曾為學社的成員作過報告。⁷

⁶ 劉大鈞：〈中國經濟學社略史〉，載中國經濟學社(編)：《中國經濟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頁353。

⁷ 同上注，頁356。

早期學社的活動主要局限在北京的高等學校，戴樂仁等人原來是想藉演講和報告的機會，在各校組織一些規模較小的學術團體，由社員各自研究不同的課題，如家庭工業、工人生活等等，這樣在個人研究的同時，也可以指導和鼓勵同學從事相應的研究。然而由於參與的學生較少，以致這項計劃未能按照原來的預定方案進行，而且當時北京政府經常以政治局勢為名，禁止召開大規模的集會，因此有關演講亦無法依照計劃舉行。此時學社的主要活動是在北京的各大學中吸收社員，大約有五十餘名學者先後加入學社，時任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的馬寅初也就是在這時被介紹加入學社，而且很快就被選為第二屆學社的理事、副社長，馬寅初的加入對於中國經濟學社日後的發展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時學社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成員開始向南方以及全國各大都市擴展，其中在上海的發展最為迅速。上海是當時遠東最大的經濟和金融中心，聚集著眾多經濟學者和銀行家與企業家，因工作關係馬寅初需要經常往返於北京和上海，在他的推動下，很多上海本地的學者和銀行家、企業家也都加入了學社，並很快成立了上海分社。同時，學社也因應形勢的變化，改變了以往一些無序的舊習，規定每個月召開一次理事會，由各理事分別在家中作東，宴請其他理事，藉此機會討論學社中之重大問題，並審查新社員入社的資格。

中國經濟學社成立之初曾草擬並通過社章，其後由於新社員不斷增加，而且留美學生中亦有類似經濟學會之組織要求加入學社，原有章程在新形勢下已多不適用，因此學社委派金問泗、程萬里和趙文銳三人為修改社章委員，徵求社員意見，接連召開四次會議，對社章進行討論修訂，並於1925年召開的第二屆年會上獲得通過，這也是目前筆者所見最早的一份社章。⁸ 在這之後，社章屢經修改，不斷完善，內容及文字亦有所擴充，中國經濟學社於1935年12月自印的一部概覽中所載的就是這樣一份新的社章。⁹ 為了便於對比，我們將前者稱為社章一，後者稱社章二。

從條文及內容上來說，社章一分為十一條暨附則五條共十六條，而社章二則分為八章四十三條，文字自然要比前者詳細得多，具體內容大都保留，也有修改，更多的則是增加。譬如社章二明確規定「本社總社設於首都」，這在原社章中是沒有的，若再參照其他原因，可以發現此時學社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密；在有關社員的條文中也有一些具體的修改，如新社員入社的介紹人由原先的二人增加為五人，而且對於新社員的加盟條件也有所限制；新社章取消了原社章中的社友條款，並將原來「名譽社員」的稱號分解為「名譽社員」（對本社事業特別提倡或於經

⁸ 〈中國經濟學社社章〉（1925年）全文載《中國經濟問題》，頁358-63。

⁹ 〈中國經濟學社社章〉（1935年）全文載《中國經濟學社一覽》（南京：中國經濟學社，1935年），頁8-13；又見上海市檔案館（編）：《檔案與史學》1998年第6期，頁25-26。

濟學術事業有特殊貢獻者)和「贊助社員」(對本社有特殊贊助者)兩種；而其中最明顯的是社章二增加了第五章「學術事業」(第27條)和第六章「基金」(第28-40條)，這一切都表明，此時的中國經濟學社業已日趨成熟，並真正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學術團體。

1927年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在這一年的上半年，北伐軍打過長江，相繼佔領了江蘇、浙江和上海，並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隨後國內的經濟、政治中心便迅速南移，很多北方的經濟學者和銀行家亦都趁此機會南下。這年春天，馬寅初也辭去了任職十多年的北京大學教職到上海任教，不久他又應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老朋友張靜江之邀回到杭州，並一度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委員會主席，後更長期擔任國民政府立法院委員兼財政委員會主任，此後他的活動主要就在江浙一帶開展。隨著馬寅初的南下，中國經濟學社的活動範圍亦為之改變，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中國經濟學社歷屆年會簡介

中國經濟學社成立後最重要的學術活動莫過於召開一年一度的年會，與會者在年會上彼此切磋學問，交流經驗，這對於社員之間相互聯絡友誼、加深了解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於早期中國經濟學社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北方，曾約定每一年的5月召開學社的年度會議，當時雖然沒有明文規定會議的召開地點，但前三次年會都是在北京舉行的。隨著國內政治局勢的轉變，學社成員也開始向南方轉移，到1927年前後，學社成員中竟有一大半旅居上海。¹⁰因此，在馬寅初的建議之下，並得到上海總商會的贊助，1927年11月召開的第四屆年會即改在上海舉行，而且從這屆年會起，由社員大會共同討論，初步擬定召開下屆年會的幾個地點，再交由理事會根據具體情形選擇其一，因此在這之後年會就分別在不同的城市舉行，影響亦隨之擴大。

從年會召開的形式上來看變化也很大，早期的年會形式比較簡單，時間也只有一天，主要是社員之間的一種聯誼活動。從第四屆年會起時間開始延長，由三天到七天不等，會議的內容亦日趨豐富，除了一般的學術交流、會務報告以及選舉產生新一屆理事會成員之外，還增加了公開演講以及參觀當地工業交通設施和遊覽名勝古蹟(費用由與會者自付)等活動；而會議的學術形式也不斷改進，譬如會

¹⁰ 據中國經濟學社1927年11月編輯的社員名錄中得知，1926年中國經濟學社上海分社的社員有73人，1927年加入上海分社的有65人，同年由總社轉入上海分社的社員有11人，合計149人；而當年中國經濟學社總社的社員才只有66人。參見《中國經濟學社名錄》(1927年11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Y4-1-351。

前均先確定本屆年會的討論議題，並圍繞議題組織學者撰文。1936年召開的第十三屆年會還採取了辯論會的形式，即圍繞一個題目「中國施行新金融政策應求外匯穩定乎抑求內價穩定乎」，選擇八位學者分為正反兩方進行辯論。¹¹ 每屆年會召開之前都要進行充份的準備，包括成立籌備委員會，設立論文、招待、宣傳諸小組，邀請黨國要人及著名專家學者報告，同時還積極尋求地方政府及商會銀行的贊助等等。抗戰爆發後學社的活動一度陷於停頓，無法按照原來的規定每年舉行年會，但是中國經濟學社的成員仍克服種種困難，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下繼續開展學術活動。

有關中國經濟學社歷年舉辦年會的情形及其特點筆者將另行撰文詳細探討，¹² 這裏只是把學社歷屆召開年會的簡況製成一表，即可看出學社歷年來的主要活動及其變化。

表1 中國經濟學社歷屆年會概況¹³

屆別	時間	地點	理事會	討論主題	有關決議	主要活動
1	1924.5	北京中央飯店	劉大鈞、戴樂仁、林襟宇、衛挺生、陳長蘅、陳達、胡立猷		通過社章，選舉職員	
2	1925.5	北京中國政治學會	劉大鈞、馬寅初、吳澤湘、楊培昌、趙文銳、金問泗、衛挺生、陳長蘅、程萬里	關稅問題	修改社章，編輯出版《關稅問題專刊》	上海分社成立
3	1926.5	北京歐美同學會	劉大鈞、馬寅初、吳澤湘、楊培昌、趙文銳、金問泗、周詒春、盛俊、程萬里			出版叢書兩種

¹¹ 參見李黃孝貞：〈記中國經濟學社辯論會並抒所見〉，《經濟學季刊》第7卷第3期（1936年11月），頁214-18。

¹² 詳見鄭會欣：〈簡述中國經濟學社的年會及其特點〉，《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待刊）。

¹³ 自第二屆年會起，理事會成員名單按選舉得票多少排列，得票最多的前兩名為社長和副社長；自第八屆年會起，每屆理事會輪流改選其中三名理事，正副社長則由理事會互相推選；抗戰爆發後理事會未經改選，仍以第十三屆年會選出之理事名單為準；由於1940年12月社長馬寅初遭國民黨當局軟禁，其社長一職即由陳其采代理。

表 1 (續)

屆別	時間	地點	理事會	討論主題	有關決議	主要活動
4	1927. 11.18- 20	上海 總商 會	馬寅初、劉大鈞、盛俊、 楊端六、潘序倫、金國寶、 周詒春、劉秉麟、李權時		籌募基金， 對全國各界 發表宣言	南京中央大 學、上海交 通大學之經 濟學會加入 本社，為團 體社員
5	1928. 9.28- 10.3	杭州 平海 路舊 省教 育會	馬寅初、劉大鈞、盛俊、 李權時、劉秉麟、戴克諧、 壽景偉、衛挺生、徐寄廬		向國民黨五 中全會提議 設立經濟議 會	
6	1929. 10.9-13	南京 金陵 大學	馬寅初、劉大鈞、戴克諧、 衛挺生、盛俊、錢永銘、 潘序倫、陳長蘅、金國寶	訓政時期經 濟政策	修正社章並 通過基金保 管委員會人 選，籌備社 所及圖書館	創辦《經濟 學季刊》， 聘請李權時 任總編輯
7	1930. 9.20-23	無錫 縣商 會	馬寅初、劉大鈞、朱彬元、 李權時、衛挺生、潘序倫、 金國寶、徐寄廬、劉秉麟	中國商業票 據市場	促進各地成 立分社，修 改社章，每 年改選三份 之一理事	杭州分社成 立，接受金 陵大學經濟 學會為本社 團體社員
8	1931. 9.1-4	寧波 縣總 商會	馬寅初、劉大鈞、邵元沖、 陳其采、陳長蘅、衛挺生、 朱彬元、李權時、楊蔭溥	救濟水災， 推動工業調 查	發表《救濟 水災意見 書》	出版《上海 工業調查 初步報告》 及《上海絲 廠調查》
9	1932. 9.16-23	杭州 浙江 省黨 部	馬寅初、劉大鈞、張公權、 賈士毅、吳鼎昌、何德奎、 李權時、戴克諧、黎照寰	國難期間之 經濟問題	建議與中國 統計學社合 組為中國社 會科學研究 委員會，並 由兩會合辦 中國經濟統 計研究所	籌備編輯經 濟學辭典， 華北分社成 立
10	1933. 8.24-31	青島 山東 大學	馬寅初、劉大鈞、黎照寰、 王雲五、金國寶、何德奎、 李權時、吳鼎昌、壽景偉	中國經濟之 改造		

表1 (續)

屆別	時間	地點	理事會	討論主題	有關決議	主要活動
11	1934. 8.26– 9.1	長沙 湖南 大學	劉大鈞、黎照寰、何德奎、 王雲五、金國寶、潘序倫、 王志莘、周作民、李權時	統制經濟政 策之商榷		刊印《社音》
12	1935. 12.26– 30	廣州 市賓 館	黎照寰、王雲五、金國寶、 潘序倫、王志莘、周作民、 楊蔭溥、馬寅初、衛挺生	國民經濟建 設		長沙分社成 立
13	1936. 9.27– 10.1	上海 八仙 橋青 年會	馬寅初、周作民、衛挺生、 王志莘、潘序倫、楊蔭溥、 李權時、劉大鈞、何廉	非常時期之 經濟與財政 問題		南京、廣州 分社成立
14	1938. 12.4	重慶 銀行 公會	馬寅初、周作民、衛挺生、 王志莘、潘序倫、穆湘玥、 李權時、劉大鈞、何廉	戰時經濟問 題(內分財 政、金融、 貿易、農業 與經濟建設 五大類)		出版論文集 《戰時經濟 問題》
15	1940. 4.28	重慶 大學	馬寅初、周作民、衛挺生、 王志莘、潘序倫、穆湘玥、 李權時、劉大鈞、何廉	戰時與戰後 之經濟問題		出版論文集 《戰時經濟 問題續集》
16	1943. 4.24–25	重慶 北碚	代社長陳其采(其他理事未 詳)	戰後經濟問 題		

資料來源：主要參閱中國經濟學社編輯出版的下列著作：《中國經濟問題》；《經濟建設》(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中國經濟學社一覽》；《戰時經濟問題》(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年)；以及中國經濟學社主辦的各期《經濟學季刊》。

抗戰勝利後，中國經濟學社曾成立年會籌備處，主任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彭學沛擔任，副主任潘序倫，秘書王維駟，成員還包括何德奎、陳行、黎照寰、楊蔭溥、劉攻芸、徐寄廬、金國寶、劉大鈞等人。¹⁴但學社的活動卻趨於平靜，完全不能和戰前的情形相比。

¹⁴ 〈中國經濟學社年會籌備處函〉(1946年8月20日)，上海市檔案館藏行政院分配上海各機關房屋委員會檔案：Q30-1-25。

學社的經費及其出版

創立一個學術團體或許不是太難，但是要長期堅持，並不斷發展、擴大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多年來一直擔任中國經濟學社社長的馬寅初對此感受尤為深刻。他曾深有體會地說，在中國從事學術研究存在四大困難：一是沒有經費，二是缺乏資料，三是沒有一個正確的統計，四是沒有一個規模宏大的圖書館。¹⁵事實也確是如此，同時，為了普及和發展中國經濟學的研究，中國經濟學社自成立以來就一直為落實這幾個目標而努力奮鬥，並獲得理想的成績。

學社經費

學社經費很大一部份是依靠社員繳交的會費以及向社會募集所得而維持，會費早期主要是由社員按年度每年繳交，但有些社員常常由於各種原因未能按時繳納。為此學社於1932年召開第九屆年會時特別修改社章，認為每年收繳會費甚為複雜，因而同意將社員分為普通社員和永久社員兩種，凡社員入社後一次性繳交會費60元者即為永久社員，以後便無需再按年繳納會費。據1935年12月召開的第十二屆年會統計，學社共有社員709人，其中永久社員321人，普通社員388人，永久社員幾乎佔了一半。¹⁶此外學社還動員社員積極捐款，理事會成員更是以身作則，學社成立後劉大鈞便按月捐款10元，周詒春按月5元，長期堅持不斷，馬寅初、劉景山等社員亦多有捐款。1927年11月在上海召開的第四屆年會決議為學社籌募基金，並成立基金委員會，推舉馬寅初、楊杏佛等十二人為委員，僅在在本次會議中社員的捐款數額即達2,000餘元。¹⁷

除此之外，學社還積極向社會、特別是向政府有關部門申請經費。據學社社長馬寅初稱，前浙江省政府主席張靜江曾撥助學社10,000元，前財政廳長錢新之則同意將寶石山保椒塔的洋房撥為學社杭州分社的社址，另一前財政廳長王惜寸亦准撥4,000元修理社所。¹⁸1929年2月24日，社長馬寅初、副社長劉大鈞和理事徐寄廎出面邀請銀行界重要人物中國銀行張嘉璈、浙江實業銀行李馥蓀、交通銀行錢新之(均為學社社員)餐敘，馬寅初聲明，將於最近向財政部具呈，請求財政部補助學社經費，請張、李諸位從旁代為鼓吹。席間理事盛灼三即時起草呈文，同時出

¹⁵ 詳見王永新：〈中國經濟學社第九屆年會紀詳〉，《經濟學季刊》第4卷第2期(1933年6月)，頁236。

¹⁶ 見〈中國經濟學社第十二屆年會紀事〉，《經濟學季刊》第7卷第1期(1936年6月)，頁202。

¹⁷ 陳震異、李可權：〈中國經濟學社第四次年會紀錄〉，載《中國經濟問題》，頁352。

¹⁸ 參見王永新：〈中國經濟學社第九屆年會紀詳〉，頁218。

任浙省財政廳廳長的錢新之亦應允補助經費。¹⁹ 其後於1936年浙江省財政廳又捐助資金10,000元給杭州分社，由總社代領。²⁰ 1934年召開第十一屆年會時，據社長馬寅初向大會報告，此時學社已擁有基金十多萬元，其中大半為政府、銀行界、實業界出面贊助。²¹

會所與圖書館

學社成立之初，鑑於經濟參考書籍不易集中使用，更由於中國的圖書館事業尚不發達，阻礙學術研究的進展，理事會因而決定自己開設一所圖書館。但開設圖書館又談何容易，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經費無法落實，為此學社委派馬寅初、陳長蘅、趙文銳、楊培昌、劉大鈞等五位理事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接洽，請求該會予以經濟上的補助。基金會董事長范源濂（靜生）對此甚為關心，當即委派也是學社社員的秘書顧翊群與經濟專員貝克（J. E. Baker）親臨學社，詳細了解學社各項活動的進展及運作情況，並指示如何申請之手續。學社為此擬就了陳請書及相關附件多份準備呈遞，但經理事會再次商議，認為學社剛剛成立，成績尚不明顯，即使申請亦未必成功，故而未曾遞交。²² 不久范源濂因病去世，此事也就因此而作罷。

國民政府成立之後，社長馬寅初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員，與省府主席張靜江私交甚篤，社員陳其采、錢新之又相繼出任浙省財政廳廳長，財政委員魏頌唐亦為學社社員，因此學社不僅相繼多次在浙省之杭州、寧波召開年會，而且還向財政廳申請捐撥西湖官產為該社設立圖書館之用。此方案由錢新之出面在浙省政府會議提出並通過，指借寶石山舊肺病院設立經濟圖書館，每年象徵性收取租金一元，期限五十年。²³ 1929年，經社員金國寶、楊宗炯等人斡旋，中國經濟學社得以廉價向南京市政府領得老王府官地四畝八分許，作為將來興建社所之用。1931年，南京市政府正式將董家橋九畝餘官地贈與學社。²⁴ 1935年3月，中國經濟學社又向上海市政府呈文，要求援引南京市政府成案，「捐贈市中心區公地十畝」；然而上海市政府則認為「中國工程師學會在市中心區建築會所之地，係依照領地規則繳價承

¹⁹ 〈中國經濟學社第五屆第五次理事會記錄〉（1929年2月26日），載《經濟建設》，頁284。

²⁰ 參見《經濟學季刊》第7卷第3期（1936年11月），頁231。

²¹ 〈中國經濟學社第十一屆年會紀事〉，《經濟學季刊》第5卷第4期（1935年3月），頁185。

²² 劉大鈞：〈中國經濟學社略史〉，頁357。

²³ 〈中國經濟學社第五屆第五次理事會記錄〉，頁283。

²⁴ 《中國經濟學社一覽》，頁5。

領，與普通領地完全相同，該社等所請求捐贈一節，實無先例可援，且照日前市中心區情形，亦無餘地可資撥給」，²⁵ 拒絕了中國經濟學社的請求。

此外1935年理事會還曾向中英庚款委員會呈請撥助學社社所建築經費，但該會聲稱因本年度已無餘款，計劃亦未能實現。²⁶

出版叢書與季刊

除了社員各自出版的大量著作外，中國經濟學社還專門組織出版叢書與社刊兩大類著作，並委託商務印書館擔任學社所有叢書和集刊的出版與發行，在學術界產生重要的影響。

叢書下分譯著、專著和論文集三大類：（一）譯著，包括王建祖譯：《基特經濟學》（C. Gide,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陳長蘅譯：《美國現今的經濟革命》（T. N. Carver, *The Present Economic Revolution in United States*）、陳清華譯：《中央銀行概論》（C. H. Kisch and W. A. Elkin, *Central Bank*）、張先德譯：《銀行信用論》（C. A. Phillips, *Bank Credit*）；（二）專著，包括陳長蘅：《三民主義與人口政策》、衛挺生：《南美三強利用外資興國事例》、李權時：《財政學原理》、賈士毅：《民國續財政史》（共七冊）、陳達：《中國勞工問題》、馬寅初：《中華銀行論》、馮柳堂：《中國歷代民食政策史》、劉振東：《中國幣制改造問題與有限銀本位制》、劉秉麟：《李士特》、楊蔭溥：《中國金融研究》、董修甲：《市財政學綱要》、賈士毅：《國債與金融》；（三）論文集，包括馬寅初：《馬寅初演講集》（共四集）、李權時：《李權時經濟財政論文集》、唐慶增：《唐慶增經濟論文集》。

社刊是以出版歷次年會中社員所提交的論文為主的一種論文集，學社認為：「叢書係社員個人方面之努力，社刊為本社團體方面之奮鬥；個人之努力固屬必要，而社員團體之奮鬥尤為必要。」²⁷ 因此學社成立後對於社刊的出版極為重視，在《經濟學季刊》創刊前和停刊後學社曾出版以下幾種社刊：《關稅問題專刊》（北京：1926年；上海：中國銀行總管理處，1934年重印）、《中國經濟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經濟建設》、《戰時經濟問題》（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年）、《戰時經濟問題續集》（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年）。此外學社還組織力量編輯出版《經濟大辭典》，預算所需經費約六、七千元。

²⁵ 參見〈中國經濟學社社長劉大鈞致上海市政府呈文〉（1935年3月），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特別市市中心區域建設委員會檔案：Q213-1-39。

²⁶ 〈中國經濟學社第十二屆年會紀事〉，頁201。

²⁷ 李權時：〈發刊辭〉，《經濟學季刊》第1卷第1期（1930年4月），頁1。

1929年第六屆年會通過出版《經濟學季刊》，並自1930年4月正式出版，直至1937年5月共出版了八卷二十九期（第八卷只出版了一期）。主編李權時在創刊號上發表的〈發刊辭〉中矢言要以歷史悠久、學術地位崇高的歐美經濟學刊物為目標，如德國的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英國的 *The Economic Review* 和 *Economic Journal* 以及美國的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那樣，將《經濟學季刊》辦成中國最著名的經濟學術刊物。²⁸ 《經濟學季刊》主要刊載社員的學術論文、書評以及各屆年會的重要論文，正如編者所說，「經濟學之重要，無待贅述，近代國家之興亡，世運之隆替，筦其機者，厥惟經濟。自經濟科學成立以來，迄今百有餘載，人類物質生活之進步，此學實為原動力。惟我國年來凡百事業，日在陰霾沉晦之中，而高深學術之研究，亦復日見消沉。本刊今後當勉竭棉薄，以提倡經濟學之精深研究為鵠，苟能挽回頹風於萬一，固編者之所切盼者也」。至於編輯方針則堅持「發言專揭真理，不趨眾好；立場無偏無黨，不激不隨」。²⁹ 創辦並長期堅持學術刊物的出版是區分近代學術團體與傳統學術派別的重要標誌，《經濟學季刊》創辦以來，社員針對當前重要的議題積極投稿，踴躍發表見解，短短幾年就在學術界贏得了極高的聲譽，影響十分深遠。抗戰爆發後《經濟學季刊》被迫停刊，這對於中國的學術界、特別是經濟學界來說都是一個極大的損失。

學社成立初期因經費有限，成員亦不多，前三年只是不定期地印發油印通知，內容除報告社務之外，還介紹一些中外新出版以及社員新著的經濟書籍。之後將其內容略加擴充，每次刊載一篇論文，一二篇對中國經濟的分析以及數十個經濟名詞的解釋，再羅列數十種各類參考書籍。³⁰ 後來人數不斷增加，社員遍及各省，平時聯絡至感困難，雖然每年都召開年會，但與會者畢竟只是少數。因此學社自1934年起開始刊印《社音》，記載學社社務進行狀況以及各地社員的消息，以互通音訊。³¹ 除此之外，學社還先後兩次編印《中國經濟學社一覽》，內容包括學社略史、總社與各分社社章、學社出版刊物以及社員著作目錄、歷屆年會所通過的重要議案、總社與各分社歷屆職員以及學社社員名錄。³²

中國經濟學社成立以來所出版的大量學術論著和期刊通訊不僅有利於凝聚社員之間的團結，同時對於推動中國經濟學的進步、探討國內現實的經濟問題也作出極大的貢獻。

²⁸ 同上注，頁2。

²⁹ 〈本刊之回顧與前瞻〉，《經濟學季刊》第5卷第1期（1934年4月），頁1-2。

³⁰ 劉大鈞：〈中國經濟學社略史〉，頁356。

³¹ 〈中國經濟學社第十二屆年會紀事〉，頁201。

³² 第一次所編學社一覽未見，目前所看到的是1935年12月以舊稿為藍本、並參考歷屆會議紀錄而新編的《中國經濟學社一覽》。

中國經濟學社的成員

中國經濟學社成立之初即討論通過了社員的入會資格，其原則是以前在國內外大學畢業、專修經濟學科，或現任職務為應用經濟學識者得為社員，而尚在學校修業、希望申請入社以求在學業上得到幫助的學生，可先申請成為社友。³³ 以後學社又根據形勢的需要和變化，吸收了部份國內大學中組織的經濟學會為學社的團體社員，同時為了便於發展和組織學社的日常工作，還根據各地社員發展的不同情況，在成熟的條件下，於全國主要地區建立分社，先後成立分社的城市和地區有上海、杭州、南京、華北、漢口、長沙和廣州等地，幾乎涵蓋了全國各重要經濟都市。根據社章的規定，凡新社員入會需要兩名社員介紹。由於學社成立後十分注意擴大成員的發展，因此社員的人數亦與日俱增。由創社初期的十餘二十人不斷擴大，到抗戰爆發前，學社的成員已接近八百人，其中永久社員人數接近一半。³⁴

學社的成員雖然不斷增加，但社員入社的標準卻絲毫沒有降低。1930年9月學社在無錫召開第七屆年會時理事會曾再次提出「社員資格應取限制主義，凡無經濟著作或經濟事業上有貢獻者，不得入社」一案，經全體大會議決通過。³⁵ 1935年12月新編的《中國經濟學社一覽》曾開列了151名社員所撰寫的578部著作的名單，包括各種經濟學專著及譯著，雖然編者自稱由於「社員著作散見報章雜誌者不勝列舉」，這個統計極不完全，但也足以看出中國經濟學社所具有的學術水準和力量了。³⁶

中國經濟學社的社員都是一時之選，幾乎包攬了整個中國當時最著名的經濟學者、大學教授，以及富有經驗的銀行家和企業家，其中有些人既是學者，又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中擔任相當職務的財政經濟官員，身份相互重疊。新編《中國經濟學

³³ 劉大鈞：〈中國經濟學社略史〉，頁353。

³⁴ 有關中國經濟學社歷年來社員增加的情形可參見歷屆年會的紀事。據1932年9月召開第九屆年會時馬寅初社長的報告稱，此時學社社員已有五、六百人，其中教育界以及大學教授佔三分之二，實業界、銀行家約佔三分之一。詳見王永新：〈中國經濟學社第九屆年會紀詳〉，頁217；次年召開的第十屆年會上馬寅初報告本社社員已達六百餘人，見徐兆蓀：〈中國經濟學社第十屆年會紀事〉，《經濟學季刊》第4卷第4期（1933年12月），頁151；1934年第十一屆年會時正式統計，學社社員共有620人，其中永久社員273人，普通社員347人，見〈中國經濟學社第十一屆年會紀事〉，頁191；1935年12月第十二屆年會統計社員共709人，其中永久社員321人，普通社員388人，見〈中國經濟學社第十二屆年會紀事〉，頁202。

³⁵ 朱彬元、徐師慎：〈中國經濟學社第七次年會紀錄〉，載《經濟學季刊》第2卷第2期（1931年6月），頁188。

³⁶ 〈本社刊物及社員著作一覽〉，載《中國經濟學社一覽》，頁19-49。

社一覽》亦同時刊載了一份社員名單(尚有部份社員因地址變動無法聯繫，因此並不完善)，除了胡漢民、蔡元培兩名名譽社員和沈鴻烈(青島市市長)、何健(湖南省政府主席)兩名贊助社員外，登記在冊的社員(包括永久社員與普通社員兩大類)共有658名，另外還有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杏佛、《申報》總經理史量才等已故社員20名。其中政界人物(括號內為當時任職)包括：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總裁)、宋子文(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委、中國銀行董事長)、甘乃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第五處處長)、孫科(立法院院長)、吳鼎昌(實業部部長)、張嘉璈(鐵道部部長)、唐有壬(外交部常務次長)、陳布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邵元沖(曾任立法院副院長、代理院長)、陳其采(國民政府主計處主計長)、謝冠生(司法院秘書長)、彭學沛(行政院政務處長)、曾養甫(鐵道部政務次長)、周駿彥(軍政部軍需署署長)、錢昌照(資源委員會副秘書長)、程天放(駐德國大使)、傅汝霖(內政部常務次長)、陳行(中央銀行副總裁)等；金融界實業界領袖有王志莘(新華銀行)、王雲五(商務印書館)、李馥蓀(浙江實業銀行)、宋漢章(中國銀行)、貝淞蓀(中國銀行)、周作民(金城銀行)、胡孟嘉(中國實業銀行)、胡筆江(中南銀行)、徐新六(浙江興業銀行)、唐壽民(交通銀行)、陳光甫(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齊致(中國農工銀行)、盧作孚(民生實業公司)、劉鴻生(輪船招商總局)、錢新之(四行儲蓄會)、穆湘玥(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林康侯(上海銀行公會)、顧翊群(中孚銀行)等；著名經濟學家包括方顯廷、朱倝、李權時、何廉、谷春帆、武培幹、周詒春、侯厚培、馬寅初、徐寄廬、唐慶增、章乃器、陳翰笙、陳達、張素民、楊蔭溥、楊汝梅、楊端六、董修甲、劉秉麟、劉大鈞、潘序倫、衛挺生、戴藹廬等，參加學社的還有其他學術領域的著名學者，如吳景超、吳經熊、金問泗、周炳琳、胡適、茅以昇、浦熙鳳、劉湛恩、潘光旦等。中國經濟學社的社員中還有幾位關心中國經濟的外國學者，如創設學社的發起人、燕京大學經濟系主任戴樂仁，研究中國農業經濟聲名卓著的南京金陵大學教授卜凱(J. L. Buck)，美國夏威夷太平洋關係研究所的康立夫(J. B. Condliffe)以及郝斯(L. A. Haass)等。³⁷從這一名錄中我們是否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學社的社員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信念、自願結合在一起的知識階層，他們雖然職業不盡相同，年齡亦有所參差，組織上更無聯繫，但在精神上 and 道義上，他們卻有著共同的追求與奮鬥目標；而從這強大的陣容中，更可以看出此時的中國經濟學社聚集了多少優秀的人才，因而學社創立不久便成為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學術團體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一個學術團體是否能夠長期堅持並且日益擴大，還與其領導人有無充滿熱情的獻身精神密切相關。中國經濟學社之所以成為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團體中的重要代

³⁷ 〈中國經濟學社社員名錄〉，載《中國經濟學社一覽》，頁55-91。

表，學社之所以充滿著巨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這都是和學社優秀的領導成員的熱情與努力分不開的，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則當屬馬寅初和劉大鈞二位，而且他們的個人經歷及其對人生道路的最終選擇，在中國經濟學社眾多社員中也是極具代表性的。

馬寅初(1882–1982)，浙江嵊縣人，北洋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先後入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1914年獲經濟學博士，並於次年回國，歷任北京大學法科教授、經濟系主任、教務長等職。馬寅初不僅與國民政府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而且與黨國元老張靜江私人間的感情也很融洽，因此國民政府成立之初馬寅初亦隨之南下，相繼受聘為杭州財務學校、上海交通大學、南京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其間曾應浙江省主席張靜江之邀，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委員會主席，並當選為第一至四屆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對於國家的財經建設提出過許多建設性意見。早於1928年3月，馬寅初就以浙江省政府委員的身份發表「統一國幣應先實行廢兩用銀」的提案，³⁸ 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其後不久財政部推行的「廢兩改元」案即基本上是按照他所提出的方案進行的；其後他又不斷著書立說，對當時國家的經濟建設和幣制改革提出許多積極的建議。但是抗戰中期以後，由於豪門資本不斷膨脹，官商勾結日益嚴重，國家經濟亦瀕於崩潰，馬寅初拍案而起，憤而聲討。³⁹ 事後不久，蔣介石竟下令將其軟禁，⁴⁰ 導致馬寅初最終與國民黨及其政府徹底決裂。

³⁸ 該提案全文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一編〔財政經濟〕(四)(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227–28。

³⁹ 1940年4月28日上午，中國經濟學社第十五屆年會在重慶大學禮堂開幕，邀請南洋華僑經濟考察團團長、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發表演講。陳嘉庚演講剛一結束，馬寅初就上臺發言，稱贊他的發言至情至理，切中時弊，緊接著他又說：「現國家不幸遭強敵侵略，危險萬狀，而保管外匯之人，尚逃走外匯，不顧大局，貪利無厭，增加獲利五七千萬元，將留為子孫買棺材！」陳嘉庚事後回憶此事亦不禁稱贊道：「馬君發言時，面色變動，幾於聲淚俱下，且重行複述，激烈痛罵，其勇豪爽，不怕權威，深為全座千百人敬仰。」參見陳嘉庚：《南僑回憶錄》(福州：福州集美校友會，1950年)，頁125–27。

⁴⁰ 當時任蔣介石侍從室第六組少將組長的唐縱曾在日記中對於馬寅初被軟禁的原因和經過有過真實的記錄。他在1940年12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馬寅初迭次公開演講，指責孔宋利用抗戰機會，大發國難財。因孔為一般人所不滿，故馬之演說，甚博得時人之好感與同情。但孔為今日之紅人，炙手可熱，對馬自然以去之為快，特向委座要求處分，委座乃手令衛戍總司令將其押解息峰休養，蓋欲以遮阻社會對孔不滿之煽動也。」參見《唐縱在大陸失落的日記》(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161。

馬寅初於1924年加入中國經濟學社，由於他的道德文章在學術界有口皆碑，立即當選為第二屆理事會的理事、副社長，並於第四屆理事會起長期擔任社長（早期理事會選舉以得票最多的前兩名出任正副社長，後來社長人選則由理事會中互選），由此可見馬寅初不僅具有崇高的學術聲望，⁴¹而他的人緣、特別是他對學社的熱情更加得到眾位社員的敬仰和信任。

劉大鈞（1891–1962），字季陶，號君謨，原籍江蘇丹徒。早年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後赴美國留學，入密西根大學學習經濟統計，畢業後回國，任清華學校教授，並兼任北京交通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教授。此外，他還先後擔任北京政府經濟討論處調查主任、中國政府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團秘書、財政整理委員會及稅則委員會專門委員等職，1928年國民政府成立後曾一度出任立法院統計處處長、國民政府主計處主計官兼統計局局長，後又受聘為軍事委員會資源委員會委員、軍事委員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抗戰勝利後，任聯合國統計委員會中國代表，駐紐約辦事，後又任經濟部駐美國大使館商務參事，直至退休，可以說他的一生都一直與政府之間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劉大鈞於1923年發起創設中國經濟學社，連任三屆社長，後長期擔任副社長。1930年他創設中國統計學社，任社長，後兩社聯合改組成立中國經濟統計調查所，他又一直擔任所長。劉大鈞是著名的統計經濟學家，在他的組織與領導下，中國經濟學社對上海及全國的工業進行了大規模的統計與調查，這不僅有利於國家工業的發展，同時對於擴大中國經濟學社的影響也具有重大的作用。

除了學社的正副社長外，這裏還應該介紹一位不太為人所知、但卻為學社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學者，他就是長期擔任《經濟學季刊》的總編輯、多次當選為學社理事的李權時。

李權時（1895–？），字雨生，浙江鎮海人。1918年畢業於清華學校，旋赴美留學，專習經濟學，獲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回國後先後受聘於上海商科大學、光華大學和大夏大學，後任復旦大學商學院教授，1930–1938年擔任商學院院長，同時還兼任《商業月報》主編及發行人。1927年於中國經濟學社第四屆年會上被選為理事，之後幾乎連續當選（按規定理事不能連任三屆，但他卸任後次年又繼續當選），這就充份說明他的學術聲望及其對學社的熱情已得到社員的普遍認同。1930年學社創辦《經濟學季刊》，他即出任總編輯，其後他不僅積極投入季刊的編務工作，而且還踴躍撰稿，季刊自創刊到結束共發行八卷二十九期，李權時一人竟發表了三十八篇論文與書評。李權時在當時的經濟學界也是一位著名的多產作家，

⁴¹ 有人統計，馬寅初著作等身，一生共撰有各類學術專著十三部，論文六百四十一篇，約五百七十一萬字。見黎建軍：《抗戰前馬寅初對外貿易思想研究》，頁4。

有人統計，自1927–1944年的十八年間，他竟然出版了三十五本經濟學專著，其中僅1929年一年就出版了十三部之多。⁴²這麼短的時間居然出版如此眾多的學術著作，一方面或許表現出他的學風不夠嚴謹，但同時也不能否認，他的著作確實具有相當大的市場，這對於普及和推動中國經濟學學術的發展無疑都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抗戰爆發後李權時一度落水，晚節不保，但他早期為中國經濟學社所作出的貢獻還是應該予以肯定的。

學社理事會成員簡介

中國經濟學社剛成立時成員不多，只是一個鬆散的組合，理事會成員不過是在社員之間相互推舉，並無相應的程序。然而隨著社員人數的增加，社員所居住的地域也不斷擴大與分散，很難集中全體社員進行選舉，因此理事會決定由金問泗、程萬里和趙文銳三名社員組成修改社章委員會，負責修改社章，並於1925年召開的第二屆年會中討論通過。新社章規定學社實行理事制，由社員於每年召開年會的一個月前以通信方式推舉理事九人，並在會議期間開票產生，以得票多少而決定，其中得票最多之前二人為社長與副社長，理事任期一年，可連選連任；由於社員分布較廣，活動範圍不斷擴大，因而社章又規定經總社同意可在社員人數較為集中之地點成立分社，但其章程不得與總社章程相抵觸。⁴³隨著社員人數的不斷增加，學社亦意識到理事會的人選亦應相對擴大，原有章程理事可連選連任的規定不甚適合，因此1930年9月在無錫召開的第七屆年會又對社章加以修正，規定自下屆起，理事會成員每年必須改選其中三分之一，應改選者不得連任。⁴⁴這樣就擴大了理事會人選的對象。

中國經濟學社自成立後即遵照社章規定，每年召開一次年會，至1936年先後召開了十三次年會，每屆年會亦都在會議期間選舉產生新一屆理事會。抗戰期間儘管條件艱苦，無法每年召開年會，但學社還是召開了三次社員大會，遷移大後方的社員均積極報名參加，然而因通訊困難，沒有辦法聯絡學社大多數社員，因而也無法進行理事會的選舉。⁴⁵

有關中國經濟學社的第一至第十三屆理事會成員及其簡歷請看下表。

⁴² 關於李權時編著出版的經濟學著作目錄可參見胡寄窗：《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頁423。

⁴³ 劉大鈞：〈中國經濟學社略史〉，頁354。

⁴⁴ 朱彬元、徐師慎：〈中國經濟學社第七次年會紀錄〉，頁184–89。

⁴⁵ 有關第十四屆理事會的選舉資料未見，但從日後中國經濟學社寄發信箋刊印的學社領
〔下轉頁268〕

表2 中國經濟學社歷屆理事及其簡歷⁴⁶

姓名	字號	籍貫	學歷	主要經歷	代表作
劉大鈞 (1891- 1962)	季陶、 君謨	江蘇 丹徒	美國密西根大學經 濟學學士	清華學校教授暨北京 大學、師範大學講 席，北京政府財政整 理委員會及稅則委員 會專門委員，國民政 府立法院統計處處 長，主計處主計官兼 統計局局長，中國經 濟統計調查所所長	《非常時期的貨幣 問題》、《工業化 與中國工業建 設》、 <i>China's Industries and Finance</i>
戴樂仁 (1878- 1951)		英國	利物浦大學畢業， 1906年受教會派遣 來華傳道	1919年燕京大學成立 後受聘任經濟系主任 兼教授，其間一度出 任國民政府農業研究 會農林工作主任	
林襟宇		浙江 永嘉	(不詳)	國民政府審計院審計 兼第二廳代廳長、第 三廳廳長	《中國審計制 度》、《投資會計》

〔上接頁267〕

導名單中可以得知理事會成員與前一屆基本一致，即社長馬寅初，副社長周作民，理事衛挺生、王志莘、潘序倫、穆湘玥、李權時、劉大鈞、何廉，除了由穆湘玥取代楊蔭溥之外，其他理事未變。見〈中國經濟學社致浦心雅函〉（1940年3月28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重慶交通銀行檔案：三八/198。1940年12月馬寅初遭軟禁後，他就未能再參加中國經濟學社的活動，其後學社的具體事務改由代社長陳其采主持，見〈中國經濟學社代社長陳其采致經濟部甘肅油礦局函〉（1943年3月13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甘肅油礦局檔案：九五/2175。然而陳其采到底是在何時、又是通過甚麼程序進入理事會的，理事會還有哪些成員，目前沒有相關的資料可以說明。根據常理判斷，並參閱《社章》的有關規定，在當時交通與通訊條件均十分困難的條件下，理事會是不可能進行改選的。

⁴⁶ 理事名單按擔任歷屆理事會當選之順序排列（參見表1），其個人經歷主要參考徐友春等（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劉壽林、萬仁元等（編）：《民國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張憲文等（主編）：《中華民國史大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周棉（主編）：《中國留學生大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等工具書。

表2 (續)

姓名	字號	籍貫	學歷	主要經歷	代表作
衛挺生 (1890- 1977)	深甫、 申父	湖北 棗陽	先後就學於日本東京大成中學、武昌文華書院、清華學校，後入美國密西根大學，旋轉哈佛大學，獲經濟學碩士	歷任國立高等師範學校、北京交通大學、燕京大學、朝陽大學教授，國民政府財政部科長、代理關稅處處長，並兼任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教授	《中國今日之財政》、《戰時財政》、《財政改造》、《中國經濟問題》
陳長蘅 (1888- 1987)	伯修	四川 榮昌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學士、碩士	北京大學經濟系講師，鹽務稽核總所翻譯，國民政府財政部秘書，歷屆立法院委員並曾兼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委員長，後任行政院主計部主計官	《中國人口論》、《進化之真相》、《財政學》
陳 達 (1892- 1975)	通夫	浙江 餘杭	清華學校畢業後保送赴美國留學，獲立德學院學士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攻讀，先後獲碩士、博士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國情普查研究所所長，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國際人口學會副會長	《中國勞工問題》、《人口問題》
胡立猷			美國密西根大學經濟學碩士	北京交通大學(1928年後改為北平鐵道管理學院)首席教授	
馬寅初 (1882- 1982)	原善	浙江 嵊縣	北洋大學畢業後赴美國留學，先後入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經濟學，獲經濟學博士	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教務長，中國銀行總司券，後南下任上海交通大學、南京中央大學教授，浙江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委員會主席，歷屆立法院委員，抗戰爆發後曾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1948年被評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中華銀行論》、《中國國外匯兌》、《中國關稅問題》、《中國之新金融政策》、《中國經濟改造》

表2 (續)

姓名	字號	籍貫	學歷	主要經歷	代表作
吳澤湘 (1897-?)	醴泉	四川 成都	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學士	北京政府國務院經濟討論處編纂，北京師範大學講師，北京交通大學、中國大學教授，後歷任國民政府軍事政治代表團秘書長、外交部秘書、駐天津特派員、重慶市政府秘書長、駐智利大使	
楊培昌			(不詳)	金城銀行香港分行副經理，國外部經理	
趙文銳	德華	浙江 嵊縣	(不詳)	外交部特派浙江省交涉員兼杭州關監督	《統計學》、《近世商業史》
金問泗 (1892-1968)	純儒	浙江 嘉興	復旦公學畢業，天津北洋大學法學士，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碩士	曾於北京政府財政部研究關稅問題，後調回外交部任通商司權稅科科長兼關稅特別會議議案處幫辦，國民政府成立後任外交部第一司司長、代理常務次長，長期出任駐歐洲各國使節	《中國與巴黎和會》、《中國與國際聯盟》
程萬里			(不詳)	(不詳)	
盛俊	灼三		(不詳)	曾任北京政府財政部駐滬調查貨價處主任，(汪偽)中國經濟研究所顧問	《海關稅務紀要》、《上海生活費指數》、《修正物價指數報告》
楊端六 (1885-1966)		江蘇 蘇州	早年赴日本留學，後留學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系習貨幣銀行專業	《東方雜誌》編輯，上海中國公學兼任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經濟組主任兼代所長，武漢大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法學院院長	《銀行要義》、《信託公司概論》、《六十五年來中國貿易統計》、《清代貨幣史稿》

表2 (續)

姓名	字號	籍貫	學歷	主要經歷	代表作
潘序倫 (1893- 1985)	秩四	江蘇 宜興	上海聖約翰大學文學士，哈佛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	東南大學附屬商科大學教務主任兼暨南大學商學院院長，後辭職創辦並主持立信會計事務所和立信會計補習學校，曾任國民政府主計處主計官、經濟部常務次長	《中美貿易論》、《高級商業簿記教科書》、《審計學》、《會計學》
金國寶 (1894- 1963)	侶琴	江蘇 吳江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	上海中國公學、復旦大學教授，後歷任國民政府財政部科長，南京市財政局局長，交通銀行總稽核，中央銀行會計處處長	《統計學大綱》、《中國幣制問題》、《統計新論》、《中國經濟問題之研究》
周詒春 (1883- 1958)	寄梅	安徽 休寧	上海聖約翰書院畢業後赴美留學，先後入耶魯大學和威斯康辛大學，獲學士及碩士學位	曾任清華學校副校長兼教務長、校長，中孚銀行總經理兼北京分行經理，北京政府全國財政討論委員會秘書長，燕京大學代理校長。歷任國民政府實業部常務次長、農林部部長、衛生部部長	
劉秉麟 (1889- ?)	南陔		北京大學畢業後留學德國、英國，獲倫敦大學政治學院碩士	武漢大學經濟系教授	《經濟學》、《財政學大綱》、《經濟學原理》、《近代中國外債史稿》
李權時 (1895- ?)	雨生	浙江 鎮海	清華學校畢業後赴美留學，獲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	歷任上海商科大學、光華大學、大夏大學教授，復旦大學商學院院長，《經濟學季刊》總編輯	《中國經濟問題綱要》、《生產論》、《經濟學原理》、《消費論》、《中國稅制論》
戴克諧	藹廬		(不詳)	《銀行週報》主筆、總編輯，日本大阪中國銀行經理	

表2 (續)

姓名	字號	籍貫	學歷	主要經歷	代表作
壽景偉 (1891-?)	毅成	浙江諸暨	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	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公學教授，國民政府實業部工商訪問局副局長、署經濟部商業司司長，中國茶葉公司總經理	《戰後歐洲之經濟》、《中國國際貿易小史》、《應用統計學》、《財政學》
徐寄廬 (1882-1956)	陳冕	浙江永嘉	杭州高等師範學堂畢業後留學日本，於東京同文書院、山口高等商業學院深造	浙江興業銀行副經理、協理、董事長，上海市商會理事長，上海市第一屆參議會副議長	《最近上海金融史》、《近代泉幣拓本》
錢永銘 (1885-1958)	新之	浙江吳興	北洋大學肄業，後赴日本神戶高等商業學校留學	交通銀行上海分行經理，上海銀行公會會長，中興公司總經理，交通銀行董事長	
朱彬元	仲梁	湖南長沙	(不詳)	建設委員會參事	《貨幣銀行學》、《世界金融概況》、《全國經濟建設之我見》
邵元冲 (1890-1936)	翼如、伯瑾	浙江紹興	晚清秀才，曾兩次赴日本學習，後到美國留學，先後肄業於威斯康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	早年加入同盟會，國民黨一至五屆中央委員、常委，國民政府成立後歷任杭州市市長、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委員長、立法院副院長、代理院長等職	《心理建設論》、《美國勞工狀況》、《廣東建設之綱領》、《歐美各國改造中之經濟與社會》
陳其采 (1880-1954)	藹士	浙江吳興	先後入學於上海中西書院、金陵同文館及江南儲材學堂，後赴日本士官學校學習	中國銀行總文書、浙行副行長，浙江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國民政府江海關監督，主計處主計長	
楊蔭溥 (1898-1966)	石湖	江蘇無錫	先後畢業於南洋公學、清華學校，後赴美國留學，獲西北大學經濟學碩士	上海光華大學商科教授，中央大學商學院教授兼工商管理系主任、代理院長，重慶大學商學院教授，浙江興業銀行南京分行經理	《上海金融組織概要》、《中國交易所論》、《中國金融論》、《貨幣與金融》

表2 (續)

姓名	字號	籍貫	學歷	主要經歷	代表作
張嘉璈 (1889–1979)	公權	江蘇寶山	北京高等工業學堂肄業，東京慶應大學財政科畢業	北京政府參議院秘書長，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中國銀行副總裁、總經理，鐵道部部長、交通部部長，中央銀行總裁	《中國鐵路發展史》、《通貨膨脹的螺旋：1939–1950年在中國的經驗》
賈士毅 (1887–1965)	果伯	江蘇宜興	上海法政講習所肄業，後留學日本入法政大學政治科，再轉入明治大學法政科	歷任北京政府財政部庫藏司、會計司、賦稅司司長，國民政府財政部賦稅司司長、鹽務處代處長、常務次長，湖北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曾兼任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	《民國財政史》、《國債與銀行》、《國稅與國權》
吳鼎昌 (1884–1950)	達詮	浙江吳興	晚清秀才，後留學日本東京高等商業學校，回國後以最優等游學畢業生中商科進士	大清銀行總務長，中國銀行正監督、總裁，鹽業銀行總經理，《大公報》社長，實業部部長，貴州省政府主席，國民政府文官長，總統府秘書長	《中國經濟政策》
何德奎 (1896–1983)	中流	浙江金華	北京大學肄業，威斯康辛大學學士、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光華大學商學院院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會辦、副總辦，上海市政府秘書長、副市長	《中國與各國之商約》
黎照寰 (1888–1968)	曜生	廣東南海	紐約大學商科學士，哈佛大學理科學士，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碩士	中國公學教授，香港工商銀行司理，廣東華商銀行經理，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會長，國民政府財政部參事兼中央銀行副行長，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校長，鐵道部常務次長	<i>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crease of Bandits in South China</i> 、《中國國民黨政策》

表2 (續)

姓名	字號	籍貫	學歷	主要經歷	代表作
王雲五 (1888- 1979)	岫廬	廣東 香山	先後在上海教會學校及同文館專修英文	南京臨時政府總統府秘書、教育部主任秘書，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法制組組長，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東方圖書館館長，抗戰勝利後相繼任經濟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部長	《岫廬自述》
王志莘 (1896- 1957)	允令	江蘇 上海	先後就學於南洋公學、上海商科大學，後留學美國，獲哥倫比亞大學學士及碩士	《生活週刊》主編，工商銀行儲蓄部主任，江蘇省農民銀行副經理、總經理，新華信託儲蓄銀行總經理，農本局協理，上海證券交易所常務理事兼總經理	《中國之儲蓄銀行史》、《農業金融制度論》
周作民 (1884- 1955)	維新	江蘇 淮安	廣東公學畢業後赴日本留學，肄業於京都第三高等學校	北京政府財政部庫藏司司長，交通銀行稽核課主任，金城銀行總經理	
何廉 (1895- 1975)	醉帘、 淬廉	湖南 寶慶	長沙雅理學院畢業後赴美留學，獲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	南開大學教授兼財政系主任、經濟學院院長兼南開經濟研究所所長，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農本局總經理，經濟部常務次長，南開大學代理校長，後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財政學》、《華北公共財政、物價與生活指數》

表2 (續)

姓名	字號	籍貫	學歷	主要經歷	代表作
穆湘玥 (1876– 1943)	藕初	江蘇 浦東	先後留學於美國威 斯康辛、伊里諾、 德克薩斯等大學， 獲農科學士、碩士	先後創辦德大、厚 生、豫豐等紗廠，任 總經理，並創辦上海 華商紗布交易所，任 理事長，歷任國民政 府工商部、實業部常 務次長，農本局總經 理	《藕初五十自 述》、《科學管理 法》

從上表可以看出，除了第一屆理事會中當選為理事的戴樂士是英國人外，學社歷屆三十七名中國籍理事都是學術界或金融界的著名人物，只有少數人的生平暫時缺乏資料，絕大多數理事的經歷還是相當清楚的。因而我們可以對他們的履歷加以分析，看看是否能夠找出一些值得思考的特點。

一、籍貫與年齡。大約三分之二以上的理事為浙江和江蘇兩省(包括上海)人，而他們的工作地點與活動範圍也主要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地區，這可能是因為江浙地區既富有中國人文傳統，又是近代西學東漸的重要地區，同時更與上海在全國乃至遠東地區的經濟地位有關；從年齡層次上來看，除了極個別人之外，他們大都出生於1880年至1890年之間，也就是說抗戰前夕他們大多處於四十至五十多歲這個思想與精力最為成熟的年齡段。

二、學術背景。除了極個別的理事(如王雲五)外，學社的理事均有出國留學的學術背景，其中經濟學家大部份都曾留學美國著名大學，多數人還獲得碩士及博士高級學位；而銀行家則主要留學於日本，如錢新之、周作民、張公權、徐寄廬、吳鼎昌等。

三、從事職業。他們當中絕大部份都曾在國內重要大學任教，著作等身，是當時著名的經濟學學者。1948年中央研究院進行第一屆院士選舉，中國經濟學社有多名社員被提名為候選人，經濟學學科原有八名候選人，中國經濟學社的社員就佔了其中的六名(馬寅初、何廉、楊端六、劉大鈞、方顯廷、陳總)，該學科最後只選出一名院士，即馬寅初；社會學學科原有五名候選人，其中包括陳達、吳景超兩名社員，結果陳達當選為院士，上述人選中馬寅初、劉大鈞、陳達、楊端六、何廉等五人曾多次擔任學社的理事，而張公權、吳鼎昌、錢新之、王志莘、周作民、徐寄廬、穆藕初、王雲五等理事則是金融界、實業界和出版界的巨擘。還有一點需要提及的就是，理事會的成員中有不少人與政府關係密切，如張公權、吳鼎昌、王雲五等幾位還一度出任主管財政經濟事務的政府官員，劉大鈞、陳其采

則長期負責國家工業和財政的統計和調查工作，由此亦可見學社理事會成員陣容之強大、學術地位之崇高。

因為抗戰爆發後受到交通與通訊諸多條件的限制，理事會無法進行改選，但我們僅從第一至十三屆理事會的理事名單中也可以發現一個特點，那就是代表性與延續性相對穩定，理事的更替並不頻繁。根據《社章》的規定，理事的產生是在每屆年會召開前一個月將候選人名單寄給每一名社員，然後在年會時召開的社員大會上檢票通過。早期的理事沒有任期規定，可以連選連任；自第七屆年會修改社章，規定自下屆起，理事會成員每年改選三分之一（即三人），應改選者不得連任，這樣候選人的名單略有擴大，但還是有限。根據表1我們可以計算出前十三屆理事任職的次數，其中進入理事會最多的幾位是：劉大鈞（12）、馬寅初（11）、李權時（8）、衛挺生（7）、潘序倫（6）、金國寶（6），當選四任的有陳長蘅、盛俊、黎照寰，三任的則有劉秉麟、戴克諧、楊蔭溥、何德奎、王雲五、王志莘等人，尤其是社長和副社長，多年來大都由馬寅初、劉大鈞二人輪流出任。早期社長、副社長人選是由投票時得最多的前兩名擔任，後來改為理事中互相推舉，馬、劉二人多年來一直擔任學社的主要領導，說明他們二位在全體社員中的威望極高。儘管他們也曾竭力推薦其他人出任，譬如1936年10月剛選出新一屆的理事會後，馬寅初就先與另一位新當選的理事周作民通氣，稱「李權時、潘序倫二先生均任本社理事多年，李先生並曾任本社季刊編輯主任，對於社務素甚熱心，擬請先生於互選之時，即選李先生為社長，潘先生為副社長，於本社前途必更多發展之希望」。⁴⁷但後來理事會互選時，由於馬寅初的聲望與威信，最終還是推選他和周作民擔任正副社長。

上述中國經濟學社理事會的這些特點並不是孤立的現象，這多少也見於當時其他學術團體中。⁴⁸這說明理事會成員、特別是主要領導人不單應是一位具有高深造詣的學術帶頭人，同時他更應是一位充滿熱情、富於獻身精神的社會活動家，而且他們還必須善於團結社員，同時又能夠熟練運用社會結構與社會網絡，這樣不論是籌集資金，或是結交政府及各界人士，都將是有利於自身學術團體的發展和壯大的。當然，如果理事會一成不變，那麼具有朝氣的年青人就很難有機會進入領導機構，長此以往對於學社的發展又會造成一定的阻力。從這一點上來說，中國經濟學社儘管模仿了西方學術團體的許多規章和制度，但在某些方面依然還是脫離不了傳統思想的束縛，這可能也是民國時期諸多學術團體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吧。

⁴⁷ 〈馬寅初致周作民函〉（1936年10月21日），《檔案與史學》1998年第6期，頁24。

⁴⁸ 參見張劍：〈傳統與現代之間——中國科學社領導群體分析〉，《史林》2002年第1期，頁83-93。

學社的功能與作用

作為民國時期一個十分重要的學術團體，中國經濟學社具有許多顯著的特點，同時它的存在及其發展也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產生積極的作用。

首先，中國經濟學社的成立開啟了中國學術交流與合作的風氣。傳統的中國學術往往局限於獨自的個人研究或受制於官方的設局操縱這兩種途徑，而中國經濟學社的成立卻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民國建立以來，學術的發展已衝破傳統的藩籬，以往那種孤芳自賞、獨立研究的氛圍已脫離現實，不可能繼續存在，一大批受到西方學術訓練的學者既不願完全受制於官方的束縛，但又希望通過一種渠道加強學者之間的聯繫，進而推動學術的發展，這樣既可以保持學者個人獨立研究的自由，又能夠在自願協助的原則下，發揮集體研究的力量，組織實施一些規模較大的學術活動。同時學社的成立也為培養新生力量創造了機會，由於學社中許多成員本身就是各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他們教書育人，因而一直注意在高等學校中培養年輕的學術人才。學社成立後相繼吸收了上海交通大學、南京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學生所組織的經濟學會為團體會員，並邀請其派代表參加每年召開的年會，這樣對於鼓勵和扶植年輕學人的成長自然會產生積極的效果。

其次，中國經濟學社的成立也為中國經濟學研究的普及與提高創造了條件。經濟學在當時的中國是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國人對此了解並不深刻，而中國經濟學社的成立正值中國社會大變革之際，也是西方學術思想迅速發展的重要時期，學社的社員多為既掌握西學理論、又有心致力於本國學術事業發展的留學生，因而將宣傳與普及經濟學知識和理論視為己任。中國經濟學社自詡，「本社素以提倡經濟學術精深之研究，討論現代經濟問題，編譯經濟書報，贊助中國之經濟發展與改造為宗旨」，因而「對於學術研究自信供〔貢〕獻頗多，亦所以歷承國內外人士之贊許」。⁴⁹ 平心而論，這番話說得並不過份。學社成立後不僅積極發展社員，還先後在上海、杭州、南京、華北、長沙、漢口、廣州等地設立分社，幅蓋面不斷擴大；同時，眾社員還積極著書立說，介紹國外新興的經濟學知識，學社更與商務印書館合作，有計劃地出版經濟學叢書（包括專著與譯著），創辦並出版《經濟學季刊》，學社在召開年會時亦安排部份社員於會議期間在高等學校或商會等場所進行公開演講，他們或是著作等身的大學教授，或是享譽學界的經濟學者，或是富有經驗的金融家、企業家，所報告的內容又都是個人的研究專長，因而達到普及經濟學知識與擴大學社影響的雙重目的。

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學社注重與現實經濟相聯繫，此時他們已不僅只是滿足於引進外國的經濟學說，而是希望創造出本國的經濟學理論並以此來促進和指導

⁴⁹ 〈中國經濟學社社長劉大鈞致上海市政府呈文〉（1935年3月）。

中國的各项經濟建設。二十世紀以來，強大國力、抵禦外侮以及建設國家、發展經濟是這一代知識份子的共同責任。因此學社成立後就一直鼓勵社員於社會發生重大經濟問題時進行演講或發表文字，他們認為這才是對社會所作之應有貢獻。⁵⁰ 學社成立後不久正值北京政府召開關稅特別會議，學社即組織社員圍繞這一議題發表意見，之後並結集出版論文集。早期年會宣讀的論文主要是個人研究所得，沒有甚麼針對性，事先也沒有進行準備；自第四屆年會起，開始於籌備委員會中設立論文股（後改為論文委員會），專門負責聯絡並印發與會學者的論文；嗣後每屆年會召開之前，都先向社員發出徵集論文的通知，並結合國內重要的經濟問題，確定當年年會討論的議題，如「訓政時期的經濟政策」（第六屆）、「中國商業票據市場」（第七屆）、「國難期間之經濟問題」（第九屆）、「中國經濟之改造」（第十屆）、「統制經濟政策之商榷」（第十一屆）、「國民經濟建設」（第十二屆）、「非常時期之經濟與財政問題」（第十三屆）、「戰時與戰後經濟問題」（第十四至第十六屆），切合中國當時經濟的實際問題加以討論，對於國家經濟復興與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

中國經濟學社發展的輝煌階段正是中國的國民經濟遭到世界經濟危機的衝擊、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並進而策劃全面侵華的危難之際，同時也是國民政府致力推動各項財政經濟改革之時。中國經濟學社處於國家經濟從分裂到統一、由和平到戰爭這一重要的轉變時期，國內發展經濟的呼聲高昂，格外需要聽到經濟學家的意見。對此學社的廣大社員大都能夠結合實際，對於國家重大的經濟政策，如關稅自主、廢兩改元、裁釐改統、幣制改革、引進外資、整理債務、統制經濟以及戰時經濟政策等措施，著書立說，建言獻策，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長期以來，中國只有金融市場而無資本市場，即使是金融市場，其組織亦極為煥散。有鑑於此，學社社員中在金融界居於重要地位的如徐寄廬、金國寶、王志莘、章乃器、楊蔭溥等人多年來一直提倡票據貼現與票據承受，並為此堅持不懈，不遺餘力，最終將其演變成事實。馬寅初社長對此加以總結，認為此一事實即可證明思想為事實之母，當然思想亦需適應社會之需要，不可距離環境太遠。⁵¹

為了加強對中國現實經濟的研究，1930年中國經濟學社決議在上海成立研究委員會，其後在1933年8月召開的第十屆年會上通過，與中國統計學會合組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並由兩會合辦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原研究委員會亦同時取消。⁵² 該所由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學社的創始人劉大鈞擔任所長，他極為重

⁵⁰ 朱彬元、徐師慎：〈中國經濟學社第七次年會紀錄〉，頁184-89。

⁵¹ 〈馬寅初社長在中國經濟學社第十三屆年會閉幕式上的發言〉（1936年10月1日），《經濟學季刊》第7卷第3期（1936年11月），頁235。

⁵² 徐兆蓀：〈中國經濟學社第十屆年會紀事〉，頁147-61。

視用統計方法來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在他的具體領導下，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成立後曾進行過兩次大規模的工業統計調查，第一次在1931–1932年間，該所與國民政府主計局、實業部以及上海市社會局、交通大學等單位合組為上海工業聯合調查事務所，對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進行統計調查。「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後，學社特別組織力量，對閘北被日軍轟炸所遭受之工廠損失進行調查統計，準備將來向日方提出賠償損失交涉時為政府提供重要參考。第二次是在1933–1934年間，該所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屬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即後來的資源委員會）的委託，對全國各地（除少數邊遠省份以及已被日本佔領的東北三省）的工廠和城鄉經濟狀況進行大規模的調查。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已將所有調查報告整理完竣，並以中文或英文先後公開發表，包括《上海工業報告》、《上海之絲廠》、《中國工業調查報告》、《吳興農村經濟》等。⁵³ 直至今日，這些統計資料仍是研究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料。

1935年11月幣制改革順利實施之後，國民經濟得以復甦，國民政府開始推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中國經濟學社亦積極予以配合，經理事會議決通過，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一次論文徵獎活動，題目就是「國民經濟建設方案」，內容可以是通論，也可以是一般經濟建設或專論特殊制度之建設。此一徵文活動得到學術界的熱烈響應，應徵者紛至沓來，共收到四十七篇應徵論文。學社理事會特聘請劉大鈞、唐慶增、董修甲三位著名經濟學家擔任評判，並採用匿名密封方式，以示公允。評選結果是一等獎（獎金200元）一名，作者梁慶椿，論文為〈吾國米穀統制計劃〉；二等獎（獎金100元）一名，作者汪惠波，論文為〈糧食統制方案〉；三等獎（獎金50元）二名，作者分別為李煥文和陳如乾，他們的論文題目均為〈國民經濟建設方案〉，⁵⁴ 獲獎論文刊載在1937年5月出版的《經濟學季刊》第8卷第1期上。兩個月後，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緊接著戰火就向全國蔓延，不僅徵文活動無法繼續進行，就連這期刊載獲獎論文的《經濟學季刊》也都成為絕唱。

對於中國經濟學社積極參與社會實踐、熱情關注現實經濟的行動，社會各界均極為重視，並予以好評，上海市商會主席王曉籟在1936年召開的第十三屆年會上的致詞就反映出商界的意見，當他談及本年中國科學社等七個學術團體在北平召開聯合年會時特別指出，「敝會以為吾國從事於經濟學者，當此國家緊要關頭，亦恆能發揮其精確之見解，負起指導之重任，其自效於國家者，決不在自然科學家之下」。他並舉例說：「年來為白銀問題，幾使吾國金融機構財政命脈為之摧毀無餘，

⁵³ 參見林美莉：〈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企業史資料簡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34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9月），頁153。

⁵⁴ 劉大鈞：〈本社徵文之經過〉，《經濟學季刊》第8卷第1期（1937年5月），頁1。

幸賴經濟學者於異說紛紜之際，抒其獨到之見解，主張革新貨幣政策，並排斥通貨膨脹之私圖，使當局得以確定方針，毅然實行，是為吾國學者能以學說於政治上發揚其權威之初步，一洗向者所譏學子僅有理論之謬誤。」⁵⁵

中國經濟學社還努力爭取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各屆年會租用會場多為免費，各地政界、經濟界和學術界也都輪流設宴款待與會者，不但為會議節省經費，更加深了彼此間的信任和理解。自第六屆會議開始，學社召開年會之前均與鐵道部商議，予與會者乘火車享受半價優惠；住宿往往亦可獲六折優待。1943年4月第十六屆年會在重慶北碚召開，當時正值抗戰期間，交通工具及燃料供應均十分緊張，學社領導特別在會前向有關部門商借輪船和汽油，亦都得到支持。⁵⁶ 當第十屆年會決定下屆年會將於重慶、溫州、長沙、廣州或北平等城市選擇其一的消息傳出後，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竭力爭取在長沙舉行，並立即致電馬寅初社長：「湘省物產，諸待考查；各項政策，亦待指導，特電歡迎，務懇貴會早日決定，以便飭屬籌備招待也。」⁵⁷ 各地如浙江、江蘇、上海、青島、廣東、福建等省市政府也都積極要求學社前來召開年會，希望藉助經濟學家的力量，推動本地經濟發展，這就說明中國經濟學社此時早已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同。

結語：學術與政治

從中國經濟學社的發展歷史上來看，學社成立之初的影響不是很大，與政府之間也沒有甚麼密切的關係；但是自從國民政府成立之後，學社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就顯得日益緊密，這可以從以下幾個事實得到充份反映。譬如國民政府成立後，學社立即跟隨政府南遷，並明確在社章中修改條文，規定總社社址定於首都南京；學社召開年會都事先邀請黨國要人親臨會場發表演講，先後出任年會主講嘉賓的包括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孫科，監察院院長蔡元培，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等中央政府高官以及青島市市長沈鴻烈、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廣東省政府主席林雲陔、上海市市長吳鐵城等地方大員。此外學社還吸收了眾多政府主管財政經濟事務的主要官員為學社的社員（名單見前），彼此之間增加認識，促進合作，這樣對於學社的發展，特別是爭取政府的資助是極為有利的。

⁵⁵ 轉引自《經濟學季刊》第7卷第3期（1936年11月），頁229。

⁵⁶ 〈中國經濟學社社長陳其采致財政部花紗布管制局局長尹任先函〉（1943年3月10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財政部花紗布管制局檔案：八二〇/19000；〈中國經濟學社社長陳其采致經濟部甘肅油礦局函〉（1943年3月13日）。

⁵⁷ 轉引自〈本社第十一屆年會預誌〉，《經濟學季刊》第5卷第1期（1934年4月），封三。

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隨後立即在上海和南京召開了全國經濟會議和全國財政會議，這是國民政府成立後為了確立今後財政經濟政策而舉行的兩次重要會議，而這兩次會議均邀請中國經濟學社委派代表參加，足見學社地位之重要。緊接著國民黨中央又於8月8-15日在南京召開了二屆五中全會，並頒佈《訓政時期約法》。在這國家和社會仿佛進入統一和建設的階段時，中國經濟學社亦對外公開發表宣言，聲稱「爰本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於黨國經濟大計亟待商榷者悉心研討，管見所及，以為在積極方面，當集合團體才智，從事經濟建設；在消極方面，當革除苛捐雜稅，裁併駢枝機構」。那麼如何才能集合團體才智呢？他們認為，「必須集合社會各種階級、各種職業之代表，與夫研究經濟之專家，合組一經濟議會」，只有如此，「一切經濟問題，不難迎刃而解」。⁵⁸ 進而中國經濟學社還以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設立經濟議會的模式，對國民黨五中全會提出成立經濟議會的具體方案與組織大綱，並認為只有這樣，才可以「整齊經濟制度」、「普及經濟利益」、「改善經濟現狀」。⁵⁹ 由此可以看出，此時中國經濟學社關注的已經不僅僅是現實的經濟問題，更表現出他們已具有一種強烈的參政議政的欲望。

與此同時，政府對於學社的功能與作用亦十分重視，財政部部長孔祥熙在第十三屆年會上擔任特約嘉賓（他本人也是學社的社員），演講的題目為「經濟復興與經濟學社之使命」。在介紹當下國內的經濟局勢以及採取的各項措施之後，孔祥熙特別向學社社員提出，「我國民眾教育尚未普及，尚有待在座各位經濟專家於研究之餘，致力於經濟智識之普及」，「尤希諸位各就專長，從事經濟學識之普及化、實用化，藉收民眾與政府一致合作之效，則吾國經濟復興前途，藉可事半功倍」。⁶⁰ 這也可以看成是政府對經濟學家所寄託的希望。

第十六屆年會召開於抗戰後期（1943年4月），值得注意的是，此刻國共兩黨對於中國經濟學社的召開都表現得格外關心，特別是蔣介石剛以個人的名義出版了《中國之命運》，這本書的宗旨就是既反對共產主義，又不贊同戰後在中國實施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為此《中央日報》特別為中國經濟學社年會的召開而專門發表社論，其中心思想就是將蔣介石的指示貫穿其間。社論稱，總裁的言論「實已提示了我國戰後經濟問題的綱領，這綱領就是說明，我們必須實施計劃經濟，而此計劃經濟的大目標很簡單，即為『工業化』三個大字」；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希望全國經濟學者，協助政府，善為規劃，使此有關國家命運的戰後經濟問題，獲得優良的建設方案」。⁶¹ 同時，《新華日報》也為學社年會的召開發表短評，以示祝賀。

⁵⁸ 〈中國經濟學社宣言〉，載《經濟建設》，頁1-2。

⁵⁹ 〈中國經濟學社建議五中全會擬請設立經濟議會案〉，載《經濟建設》，頁3-6。

⁶⁰ 參見《經濟學季刊》第7卷第3期（1936年11月），頁227。

⁶¹ 〈社論：戰後經濟問題〉，《中央日報》（重慶），1943年4月26日，第2版。

短評說：「我們從抗戰大勢觀測，抗戰還是長期艱苦，今日最急切的要務，莫過於發展戰時生產，以達自力更生、爭取勝利的目的。所以中國經濟界的優秀份子，當前最迫切的工作，是在如何為發展生產事業做些實際的貢獻，這也可以說是一種責任，望經濟學社的專家們注意及此。」⁶² 由此可以看出，此時國共兩黨都已充份認識到知識份子的作用，並開始對他們進行各種方式的拉攏與利用，爭取得到他們的認同。

抗戰勝利後，中國經濟學社迅速成立籌備處，並積極部署從大後方返回上海的計劃。此時中國經濟學社與政府間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擔任籌備處主任的彭學沛是職業官僚，1930年以來曾歷任國民政府內政部政務次長、代理部長，行政院政務處長，交通部常務次長、政務次長，戰時生產局副局長，1945年5月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1946年3月任中央政治委員，5月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籌備處委員還包括中央銀行常務理事、國民政府還都接收委員會委員陳行，國民黨第六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央信託局局長劉攻芸等財政官僚，而多年擔任學社社長的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卻被排斥在外。當然這樣的籌備處對於學社的發展可能也不無「好處」，當籌備處剛剛遷回上海，暫租江西路421號306室作為辦公地點後不久，行政院分配房屋委員會即將原日僑居住的長春路餘慶里141號房指定為學社的社址。⁶³ 然而接踵而來的卻是內戰爆發，通貨膨脹，在決定中國兩種命運、兩條道路的重大抉擇面前，學社的成員發生分化，有的遠走海外，有的退居臺灣，更多的社員則留在了大陸，但是中國經濟學社卻再也沒有出現過昔日的那般輝煌。1953年，中國經濟學社奉命將學社的資產，包括房屋、圖書、資料、存款、債券、股票等全數移交給中國新經濟學研究會上海分會，⁶⁴ 這一年正好距中國經濟學社創立整整三十年。

從中國經濟學社發展的歷史以及學社社員的最後歸宿中我們是否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儘管中國經濟學社長期以來一直標榜其宗旨為「專揭真理，不趨眾好」、其立場是「無偏無黨，不激不隨」，⁶⁵ 但是大量的事實卻說明，在中國現實的政治環境之下，任何一個學術團體或者個人要想完全脫離政治而獨善其身實際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⁶² 〈短評：對經濟學社的希望〉，《新華日報》（重慶），1943年4月25日，第3版。

⁶³ 〈中國經濟學社年會籌備處函〉（1946年8月20日）。

⁶⁴ 〈中國經濟學社移交賬目清單〉（1953年），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檔案：C43-2-42。

⁶⁵ 〈本刊之回顧與前瞻〉，頁2。

On the Historical Role and Impact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Society

(A Summary)

Cheng Hwei-shing

The Chinese Economic Society was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academic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Compared to other professional societies at that time, it had the longest history and the largest membership. Most of the council members were eminent economists and university professors, leading bankers and entrepreneurs or government financial officials. Being the leading scholarly society in the country, the Chinese Economic Society held annual academic conferences; published and translated a large amount of economics works and founded an important academic periodical, the *Quarterly of Economics*. At a result, the Chinese Economic Society had made a huge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However, there has been hardly any academic research on this prominent organization. Drawing on the *Quarterly* and other publications issued by the Society as the primary sourc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hierarchy of the Society's leadership and seeks to arrive at an objective appraisal of the Society's historical role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